

陶行知教育學初探

何國華



華南師範大學教務處
廣東省教育科研所

陶行知教育学初探

(华南师大各系公共课教材)

何国华著

华南师范大学 教务处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印行

1989年9月

曠代陶夫子

高風古所欽

弦歌村舍起

桃李滿園陰

不帶半根草

捧來一顆心

於茲四十載

猶繞哲人音

題贈

何國華同志新著陶行知教育學初探

楊立彬／五九年教師節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代序)

王 越

在中外教育史上，有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这就是陶行知先生。

他终年仅五十六岁（1891~1946），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求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生；为开辟人民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为创建适合时代前进的教育理论而呕心沥血。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是不朽的。

陶行知站在时代的前头，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显示出科学的预见性和高度的创造性。

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外患严重，忧时之士，有的主张发扬传统为立国之本；有的则认为模仿外国，才能转弱为强。在文化教育方面，表现为旧学与新学之争。在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发表文章，既抨击“沿袭陈法”，亦反对“仪型他国”，而主张下艰苦工夫，自辟蹊径。以当时的学制改革来说，他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我国的学制，经过仿效日本，取法德国，又转而模仿美国，学来学去，总是四不像。因此，他主张应采取科学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国外的经验，要有所选择，以期制订出一个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的学制。更可贵的是他认为“国家有一个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我们未尽到责任。”他本着这种宏大的心愿努力开展平民教育，到了二十

年代后期，他积极从事于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他明确指出，政治上的革命与教育的革命不能分离，必须同时并进。这时，共产党人与之合作，旨在培养师资骨干，扎根农村，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及其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共产党人恽代英曾致函毛泽东，认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可见陶行知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共产党人不谋而合，可以说是时代的号角。

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运动，又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美国的杜威教授，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并提倡实验主义。陶行知与胡适都曾受业于杜威。杜威来华演讲，陶胡两人任翻译之责，广为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要旨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上学”。陶行知依此从事教育实践，不久即发现杜威的学说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乃把它倒转过来，而建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此说主张以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生活要求作为教育的根据。在方法上提倡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来指导学习。强调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使他能想、能干、能看、能谈；并要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能在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要解放他的时间，不使他的功课表填满，不迫逼他赶考，而让他有时间消化他所学，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等等。陶氏反对脱离社会需要、死扣书本、理论脱离实践的教育，也反对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建国以来的四十年，我国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

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尚有待解决。例如人口增殖过快，发展教育与培养人才不免迟滞的问题，都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两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民族的盛衰、国家的荣枯。以人口问题来说，二十年代美国的山格夫人来华，宣传节制生育的重要性，收效甚微。二三十年代陶行知鉴于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膨胀，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乃于1931年著文指出，中国要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是无疑的。但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致“把财富都吃光了”，因此“多生主义”是中国人民贫困原因之一（在这儿陶氏没有忽视封建剥削及帝国主义剥削之为害）。他以我国的土地、资源生产力、经济状况的统计数字为根据，说明人口与生活、人口与教育水平的关系，并郑重指出，多生与贫穷落后、多生与文盲众多，密切相关。因此，他主张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要注意到少生孩子，教育者的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就在1940年，他对重庆育才学校的教职员工，曾提出节制生育的要求。陶氏于此还提倡“五生世界”之说，供人思考。建国后五十年代有识之士马寅初与钟惠澜等向政府敲起警钟，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但忠言逆耳，横受压制。二三十年间，人口失控，今日竟达十一亿之多，比较陶氏著论时，我国人口增加三倍。这个沉重的包袱还愈来愈重，使人寝食不安。有一个统计，就人均收入来说，1979年中国在上居第108位。尽管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6年后，即1985年，它却因人口增长而降至第126位。这个数字实在使人惊心动魄，也更使人怀念陶行知等人的远见卓识。

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教育为本。陶氏说过：“做一个

现代化的人必须取得现代化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化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参加在现代化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化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钥匙便是活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普及教育之最大使命，便是把这个钥匙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陶氏毕生之主要精力，便是以身作则并组织同志为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而奋斗，艰苦卓绝，感人至深。但在解放初期，竟因批判武训而株连陶氏。使研究陶氏学说，成为禁区。直至八十年代，才为他平反。假如数十年间，我们能参照陶氏兴学育才、人尽其才的战略构想，结合我国解放后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因时制宜，大力发展教育，则今日何至有“最大失误”之叹！

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经济力量强弱的对比，是社会生产力高低的对比，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对比，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要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普及教育。例如西方在1797年已制成一台蒸汽机车，但掌握蒸汽机车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还有待培养，直至二三十年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蒸汽机车转化为实的生产力。于此足见科学技术有赖于教育而发挥其效用。陶氏于1930年和1931年之间，考察日本的国情，得到一个结论是日本之强在于科学发达。陶氏于1932年著文指出，中国的第二条出路是教人“创造富的社会”，要创造富的社会，有个重要途径，就是“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和“工业化的农业”。他郑重提出：“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

我们要创造合理的工农业文明，必须注重有驾驭自然力量的科学。”因此，他主张科学教育要注意自然科学的训练，那种只读书籍、听科学讲演而不做实验的，“便是洋八股而非真科学”。总的说来，陶氏这方面的主张与我们实现四化的要求基本上若合符节。

如上所述，陶氏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中肯的意见，可资参考。他高瞻远瞩，大力鼓吹职业教育。积极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付诸实践，取得了成效。他侧重师范教育，对乡村师范教育极端重视。他毕生的信念是培养优良师资及其他教育工作人员以发展教育，乃兴邦之本。此外，他对幼儿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道德教育、德育、美育、以及诗教艺术、中西文化，等等，都有其创辟的见解，内容丰富，历久弥新。

当然，陶行知不是“一贯正确”的教育家。他在初期，曾有过过于天真，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在不断实践，不断修正错误中，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如上所述，他曾推广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由于实践过程中，觉察此说之不可信，因而幡然改图，另创切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学说。此外，他在青年时期，曾崇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把自己的原名（文濬）改为知行。通过实践，通过科学知识之掌握，乃推翻王说，而于1927年正确地掌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一条具有唯物主义的原则，并再改名为行知。三十年代后期，他前往海外，宣传抗日救国，并在伦敦瞻仰马克思墓，赞叹马克思的宏论。他自己更明确指出，“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要为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进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

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需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这一段话具有唯物辩证法的要素，显而易见。

1943年陶氏进一步以诗歌的形式说明矛盾统一、从量变到质变、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定律。他掌握了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在中国的救亡运动中，在教育实践中，在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中，就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陶行知以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自动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视高官厚禄如敝屣。摩顶放踵，含辛茹苦，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团结同志，办平民教育、乡村师范、科学教育，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都是在困难丛生，阻力重重的环境中百折不挠，坚持下去。他的最高理想是“生活教育要解放全人类”，他说过，“因为它（晓庄）爱人类，所以它爱人类中为数最多而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它爱中华民族，所以它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他主张“爱满天下”，但是，他对于社会中的丑恶事物，对于反动政府的压迫，却坚决斗争，毫不妥协。他在三、四十年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一往无前，视死如归，表现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品质。毛泽东称陶氏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颂扬他可作万世师表，陶氏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作者何国华副教授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理事，曾任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秘书长。他早年崇敬陶行知先生并笃信其学说。四人帮垮台后，深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鼓舞，1979年初，他毅然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宣扬陶先生的

后 记

这本铅印讲义是我于1988至1989学年度给我校中国近现代教育史陶行知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课程的讲授纲要；也是于1989年上半年开始给我校各系1986级开设的公共选修课《陶行知教育学初探》的讲稿。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达三百多人。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还在五十年代初，我负笈于北京师大教育系时，曾迷恋于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教育思想。及至毕业分配至福建师院教育系任助教时，由于众所周知的遭遇，1958年起，我开始过体力劳动的生涯，工余我特别喜爱读陶先生的著作和记述他生平活动的书籍，从而增添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记得当时我还特地向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古旧书店函购得陶先生的一批著作（限现存放在华南师大“陶行知纪念馆”陈列柜内的）；还写了《陶行知与胡适》、《陶行知故事》一类文章。当然，文章是无可能被发表，只能锁入抽屉，敝帚自珍而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我已在中学和师专为人师表了，于课余曾情不自禁地上海《文汇报》和嘉应师专《百花洲》杂志发表了多篇介绍陶先生生平和学说的文章。1981年10月21日，应邀参加在广州市起义路市教育学院隆重举行的纪念陶先生诞辰90周年盛会，亲自聆听了陶先生的一群弟子们合唱陶先生手写的歌词谱的歌曲，观看了一幅幅介绍陶先生的珍贵照片。1984年10月中旬，应邀赴陶先生的故乡安徽歙县隆重举行“陶行知纪念馆开馆典礼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学术年会”，接着参加了“全国十七个省市代表在屯溪市华山宾馆举行座谈会，倡议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活动。这几年来，先后应邀参加了在北京、武汉、上海、

广州等地举行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或“陶行知全集出版的学术讨论会”，使我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无愧为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个较为完整系统、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也使我更为坚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的古训。

本讲义原定于今年6月出版问世，以应同学期末考试之需，由于手稿被怀集县邮递员不慎丢失，虽幸失而复得，但终被耽误了印刷时间。本讲义共二十三章，尚有《学校管理》、《体育卫生》等八章暂未能一起付印，只好留待下次正式出版时才补齐了。

我要深深感谢陶先生二十年代初在东南大学执教时的高足弟子、我省陶行知研究会第一任会长、现任暨南大学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王越教授给我的厚爱，他于百忙中认真批阅本讲义并慷慨为之作序；他更以长者心肠敦敦勉励我要在言行上争取以陶为师。全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我省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同志于百忙中欣然为本书题词。这都给我极大的荣誉和鞭策。我校前副校长、我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黎克明教授不断鼓励我认真准备好在我校各系开设《陶行知教育学初探》课程，俾能与本校“师陶园”、“陶行知纪念馆”一起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民教师的重任。这同样给了我极大的策励。本书承著名书法家、教育家何绍甲教授欣然赐题封面书名。不胜感激。同时，得蒙广州市白云农工商公司和白云行知职业中学高度发扬爱心，各分别乐助印刷费人民币一千元和三百元，谨此深深表示敬谢之忱。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少错误乖谬之处，敬请识者诸君不吝教言，严予批评指正。

作者 1989年8月写于华南师大陶行知研究室

目 录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代序）……………王 越

第一章	生平活动简介……………	（ 1 ）
第二章	教育思想特点……………	（ 15 ）
第三章	哲学政治思想……………	（ 28 ）
第四章	生活教育理论……………	（ 43 ）
第五章	普及教育……………	（ 57 ）
第六章	幼儿教育……………	（ 79 ）
第七章	成人教育……………	（ 94 ）
第八章	师范教育……………	（ 117 ）
第九章	人民教师……………	（ 136 ）
第十章	职业教育……………	（ 152 ）
第十一章	科学教育……………	（ 171 ）
第十二章	创造教育……………	（ 201 ）
第十三章	人才教育……………	（ 227 ）
第十四章	教育评价……………	（ 252 ）
第十五章	家庭教育……………	（ 269 ）
后 记	……………	（ 291 ）

第一章 生平活动简介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大众诗人、革命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儿童。他青年起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为了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提高民族的素质，探索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道路，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历尽种种艰难险阻。他对祖国独立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留下的三百多万字的教育遗著，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宝贵的财富和指南。

陶行知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安徽歙县人，生长于农村，家境清贫，幼年受父亲教育。14岁始入歙县县城崇一学堂就业时，他曾在学堂楼上卧室墙上题词：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该校为教会学校，两年后，校长博格（英国人）回国，致学校停办，他不得不转入杭州广济医学堂肄业，才三天后，由于学校对非基督教学生在选课、学习方面的歧视，他愤然离校。他回到徽州攻读了一年英文，1909年（18岁），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肄业，三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他回到徽州，被选为县参议会秘书，工作半年后，又回到金陵大学中文系学习。由于同学协助和当局信任，他开始担任该系学报《金陵光》编辑，积极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他勉励同学要“及时努力，使中华民族大放光明于世界”。这时，他深信明代哲

学家王阳明（1472—1528年）“知行合一”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深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至1934年7月16日起，才改名为“行知”）。同时，他在该校布朗和亨克两位博士指导下，他被杰克教授主张的基督教义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所感动，1913年，他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1914年（21岁）6月，他完成在金陵大学第五学年学业时获得了第一个学位。毕业论文题为《共和精义》，它充满了民主革命思想。同年（1914），他在父母和亲朋帮助下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与孙科同学。一年后，他取得政治硕士学位，在学期间，曾任学生俱乐部的秘书。由于坚信“用教育达到民主。……没有一套真正的民众教育制度，真正的民国不可能存在。”（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写《给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罗素的一封信》）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教育科学，深受杜威教授（1859—1952）和孟禄教授（1869—1947）的器重，取得了教育学监学位（相当于教育学硕士），与胡适同学。后来，1929年12月4日，他又接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科学博士的荣誉。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自美国学成归国，即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当时的教育科包括教育、心理、体育三个学系，即相当于抗战时期的师范学院）、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主任干事、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务。

他归国后在南京高师任职第二年，曾积极提出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的主张，即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他指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这与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教给学生以“猎物”，不如教给“猎

枪”；授以“鱼”，不如授以“渔”的含义是一样的。他当时提出的上述的改革主张，曾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及至次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南京高师学堂才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1918年，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的主张。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倡导职业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

陶行知于二十年代初曾为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而呐喊。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继续进行改革，就包含有提倡男女同校和招收女生等措施。

他对我国于1922年11月颁布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又称为“六三三四制”），曾作出一定的贡献。其中情况是：1921年10月29日，陶行知陪同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务长、教授孟禄博士（他留美时的老师）来广州进行科学教育实际情况的调查。由陶行知担任翻译。同年11月初，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代表，被选为当时正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学制”起草委员之一，而被留在广州参加讨论和制订改革学制的新方案的工作。这也是陶行知生平第一次来到祖国南大门的广州市。

1923年7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1921年，南京高师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职，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工作。同年8月初，他迁家至北京。为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他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印出版《平民千字课本》、《平民周刊》，奔走了十多个省市，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

1926年，陶行知与赵叔愚教授开始一起提倡乡村教育。他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发表的全国乡村教育改造的宣言书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85%的人口在农村，只有教育向农民普及，为改造农村服务，中国才有光明前途和希望。为此，他决心“筹备一百万元资金，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7年3月15日，他与赵叔愚一起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创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正式开学。不久，即1928年和1929年，他又在浙江肖山和江苏淮安县创办了湘湖乡村师范和新安小学。积极从事改造农村人才的培养工作。

晓庄师范是一所新型的学校，他大力破除硬灌死读的旧传统教学，大力倡导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提出教育要和社会实际，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做三者要密切结合。例如，该校入学考试，除考语文、数学、常识三科外，还有开荒、五分钟演说两门考试。全国24个省都曾先后派人来参观学习。外国许多教育家，也慕名来参观，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教授（1871—1965年）于参观后写道：“在我这次参观考察后，觉得晓庄学校办得很好，今后不论我走到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我都要说中国的南京有个晓庄学校办得很好，它是代表世界教育的一道曙光”。

陶行知在自己教育实践中，逐步感到从自己老师杜威所学得的所谓“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一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社会中行不通，他给它“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把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教育试验和探索，选编成《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于1928年出版问世。